

429842

185
62872
72

法家代表人物介绍(二)

194
85
2872
2
人民出版社

法家代表人物介绍

(二)

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2.5 字数 52 千

1974 年12月第一版 1974 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11118·9 定价: 0.16 元

毛主席语录

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。

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。

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，如果没有革命理论，没有历史知识，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，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。

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，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，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。

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，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。

目 录

孙 武	(1)
西门豹	(6)
孙 臆	(10)
萧何与曹参	(15)
贾思勰	(22)
范 缜	(28)
刘知几	(33)
刘禹锡	(37)
李 贺	(42)
沈 括	(47)
陈 亮	(54)
张居正	(59)
龚自珍	(65)
魏 源	(70)

孙 武

孙武（生卒年不详），春秋时法家代表人物之一，齐国人，后来为吴国将军。孙武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学家。他善于用兵，并总结作战的经验，写成兵法十三篇，被称为《孙子兵法》。

春秋初期，吴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，它南边是越国；西边是强大的楚国。阖闾（音合庐）做了吴王后，发奋图强，任用楚人伍子胥为相。孙武是伍子胥的朋友。伍子胥就将孙武的兵法十三篇献给吴王，向吴王推荐孙武。吴王阖闾读了孙武的兵法后，很高兴，便用孙武为将军。

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中记述了孙武以法治军的故事：

孙武第一次见到吴王阖闾时，吴王说：“你的十三篇兵法我已经读过了。你可不可以小规模地训练一些士兵让我看看呢？”孙武说：“可以。”吴王又问：“训练妇女行不行呢？”孙武又回答说：“行。”于是，吴王在宫中挑了一百八十名宫女交给孙武，吴王亲自坐在高台上看孙武练兵。

孙武把一百八十名宫女分为左右两队，让吴王的两个宠姬（音基）分任左右队长，又把矛戟分发给她们。孙武对她们说：“吴王让我教你们操练，要知道军令如山倒，令出法随，决不能违背。”接着，他向大家讲解了操练的方法，连如何分清左右前后都说到了。部署已定，孙武便“三令五申”

（发了三道号令，作了五次反复说明），发出数号：“向右转。”那知宫女们却嘻嘻哈哈，笑做一团。孙武对大家说：“部署得不清楚，军令没有弄明白，将帅应当负责任。”他

重新“三令五申”，随着又发出鼓号：“向左转。”可是，宫女们还是嘻嘻哈哈，不按命令操练。孙武发火了，他板起面孔，对执掌军法的人说：“军令和操练方法我都交代清楚了，大家还是不照办，那就是队长的责任了，左右队长应受军法的处分！”他喝令把左右队长拉出去问斩。这时，吴王在高台上看见了，急忙派人赶来说情。孙武回答说：“我既受命为将，一切就得照军令军规办事。如果君王的旨意和军令军规相违背，我是不能听从的。”孙武坚决按军法办事，把吴王的两个爱姬杀了，另外又挑了两个人为队长，重新开始操练。这时，宫女们不敢嘻笑了，都小心翼翼地照军令操练，前后左右，丝毫不乱。孙武派人向吴王报告说：“兵练好了，请王下来检阅，现在指挥她们去赴汤蹈火，她们也不会胆怯了。”

由于吴王阖闾革新图强，由于孙武推行法家的军事路线，吴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起来。公元前五一一年和公元前五〇五年，吴楚两次交战，吴军在孙武指挥下，获得大胜，吴军攻下了楚国国都郢（音英，今湖北江陵北）都，要不是秦国救助，楚国就灭亡了。通过吴楚战争，由中原入楚的先进文化，更加迅速地传播到了长江下游。

孙武处于春秋末期，当时，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十分频繁，如吴、楚之间连年打仗，甚至一年开战七次。战争双方出动的兵力，达数万之多，作战时战略战术的要求，也日益提高，经验总结也日益丰富。同时，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夺取政权，迫切需要总结战争的规律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孙武写成了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。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兵书。伟大领袖毛主席对《孙子兵法》中的一些论述给予很高的评价。毛主席说：“战争不是神物，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

运动，因此，孙子的规律，‘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’，仍是科学的真理。”

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，《孙子兵法》反映了鲜明的法家观点。在当时，如何看待战争，儒法两家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。反动儒家为了维护已经“崩坏”的“礼乐”，挽救摇摇欲坠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，拚命鼓吹“仁义忠恕”，反对新兴地主阶级使用革命暴力。孔老二狂叫“去兵”，孟轲更是声嘶力竭地叫嚷对主张用兵的人处以极刑（“善战者服上刑”）。显然，儒家的这些观点是与历史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的。春秋以后，奴隶制日趋没落，封建制日益兴起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要求统一，以封建制代替奴隶制。以战争手段完成统一事业，是历史赋予新兴地主阶级的任务。孙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，在兵法的一开头就强调了战争对于国家存亡的重要性。他说：“兵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”（《始计篇》）孙武的这种思想，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用战争手段夺取政权的政治要求，也正是法家的共同主张。孙武之后不久，著名法家商鞅提出“以战去战”，主张用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。另一著名法家韩非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耕战政策，指出：“富国以农，距敌恃卒”，认为耕战是富国强兵的根本。这些论述，不仅成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理论基础，而且成为历代法家坚持抵抗政策、反对投降卖国的思想武器。

《孙子兵法》中，闪耀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。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（《谋攻篇》），这一科学的论断告诉我们，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空想出发制定作战方案，要把战争放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。孙武在兵法中还明确指出：用兵的胜败，“不取决于鬼神”，而是“取于人”，取决于

“知敌之情者”（《用间篇》）。这些论述，在客观上有力地批判了儒家鼓吹的“天命论”和宗教迷信的唯心主义战争观。

《孙子兵法》还具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。在兵法中，简要地论述到了军事手段与政治目的的关系；战争与财力互相依附的关系；讲到了进攻，也讲到了防御；讲到了速决，也讲到了持久；讲到了分散，也讲到了集中；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矛盾对立的范畴：敌我、主客、众寡、强弱、攻守、进退、奇正、虚实、动静、勇怯等等，并论述了这些对立面的互相依存和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。兵法中指出：“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”（《虚实篇》），这是一种发展变化的观点，认为用兵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则，只有根据情况的变化，掌握战机，取得胜利者，才能称得上“用兵如神”。《孙子兵法》还根据长期作战的经验，能够从某些现象观察到敌人的一般情况，如“敌近而静者，持其险也；远而挑战者，欲人之进也”；“尘高而锐者，车来也；卑而广者，徒来也”（《行军篇》）。等等。这些，具有从分析矛盾双方的特点出发，摒除事物的假象，去认识事物本质的辩证方法。

孙武在他的兵法中，还强调以法治军，赏罚分明。他要求将帅爱护士卒，做到“可与之俱死”（《地形篇》）。当然，这对剥削阶级的将帅包括孙武自己来说，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，但却也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处在上升时期奖励拼战的精神。接着，孙武又说，有赏也必须要有罚，如果“爱而不能令，厚而不能使”，那就“不可用也”（《地形篇》）。他认为，只有“令素行者”，即坚持赏罚制度的，士兵才能心服，军队才有战斗力。孙武这种以法治军的思想，与儒家

那种所谓“以礼治军”的反动思想，对立是十分鲜明的。

当然，孙武有他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。《孙子兵法》中反映的还只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，它不可能进一步深刻论述战争和政治、经济的关系，也没有能正确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。它虽然讲了战役、战术的规律的运用，但不能认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，而且过分强调了将帅的作用。

总的来看，《孙子兵法》作为一部在我国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重要兵书，它揭示了战争中的一些重要规律，在我国历史上乃至外国的历史上有过相当大的影响，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。

西 门 豹

西门豹，战国初期的魏国人，大体与李悝同时，生卒年月不详。

有关西门豹的历史记载很不完全。仅就残存的资料看，他是李悝的法家路线的积极推行者，他崇尚法治，重视耕战，他在治邺（现在的河北省临漳县）期间，政绩显著。韩非称赞他为“有道术之士”，王安石说他执行的政策是“利民”、“尚刑”，这都说明他是法家、政治家。特别是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，敢于反对宗教神学，反对儒家宣扬的“天命”，表现了不信神鬼的可贵的战斗精神。

西汉末年褚少孙增订的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中关于西门豹治邺的记载，生动地叙述了西门豹大破“河伯娶妇”骗局的故事。

在魏国，流经邺地全境的漳河，水势狂暴，时常泛滥成灾。“三老”、“廷掾”等反动官吏、奴隶主贵族和巫祝（反动巫婆）勾结在一起，利用漳河水害，用宗教迷信的形式，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。他们把漳河水害说成是河伯（河神名）显圣，要每年给河伯选送美女做妻子，才可保平安。他们以“为河伯娶妇”为名，向人民横征暴敛，每年“收取其钱得数百万，用其二三十万”，把其余大部分钱装入他们的腰包。被选中的民女，强行梳妆打扮，抛进汹涌的漳河水中。严重的天灾人祸，使得人民贫困交加。家里有长得好看一点的女儿，只好逃亡在外，骨肉分离。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，人民生活极端痛苦。

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西门豹来到邺地为邺令。他作了一

番调查研究，了解到“为河伯娶妇”的真相。于是，他机智勇敢地进行了一场铲除反动旧习的斗争。

他先是不动声色地表示，在为河伯送新娘时，希望三老、廷掾和巫祝都把新娘送到河边，他自己也要去送。到时，他果然去了。在两三千群众面前，他装得煞有其事地说：“让我看看新娘子长得怎么样？”然后，又说：“这姑娘长得不好，请大巫婆去报告河伯，再找一个漂亮的姑娘，过几天再送去。”说着，就让人把大巫婆扔到漳河水里。等了一回，又说：“大巫婆怎么还不回来？让巫婆的弟子去催一下吧”。这样，又连着把三个小巫婆投入了漳河。紧接着，西门豹又以同样的理由，把三老投进河中。为了把斗争继续下去，西门豹还“簪笔磬折”（把笔插在头上，弯着腰），装着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。这时，其他参与这个骗局的反动家伙都吓坏了，听说西门豹还要投人下河催促，一个个跪倒在地，“皆叩头，叩头且破，额血流地，色如死灰”，奴隶主贵族的威风扫地以尽。西门豹这才威风凛凛、从容自若地说：“你们都起来吧，河伯留客也太久了，你们都回去吧，我也回衙门去了。”就这样，赢得了斗争的胜利，从此，没有人再敢提“为河伯娶妇”的鬼话了，把人民的一大灾患消除了。

西门豹在顽固的反动势力面前，敢于反潮流，挺身而出，不畏强暴；同时，他又善于斗争，巧妙地运用了“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”的斗争策略，戳穿了宗教迷信的骗局，把反宗教迷信的斗争同反对奴隶主反动势力的斗争结合起来，保卫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，打击了奴隶主贵族。

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，从来都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。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把唯心论作为自己的反动思想武器。孔老二之流鼓吹“鬼神”、“天命”的最终目的，就是妄图

说明反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是“受命于天”的，妄图以此镇压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们的反抗，维护奴隶主的腐朽反动统治。新兴地主阶级要革命，要夺取政权，就要破除迷信，用无神论战胜有神论，用朴素的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。西门豹大破“河伯娶妇”的骗局，也是他在邺地推行法家路线的必要的革命措施。采取了这个革命措施，就在政治上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反动势力，为实行“法治”扫平了道路。同时，也有利于人民，有利于发展生产。

当然，破除了迷信不等于斗争结束。兴修水利，根治河患，发展农业生产，才能巩固胜利，也是法家的根本主张。于是，西门豹在破除了“为河伯娶妇”的迷信后，为了消除漳河水患，就建议兴修水利。在他的主持下，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，开筑了十二条渠道，引漳河水灌溉民田，逐步改变了当地的贫困落后面貌。许多田地由原来的盐碱地变为良田，每亩（古代的亩，约合现在的十分之三亩）产量增加到一钟（约合现在的一百二十多斤），比其他地区亩产高出四倍多。生产的发展，从经济方面巩固了新兴的地主阶级专政。

西门豹任邺令期间，在注重发展生产的同时，也注意加强民众的军事训练。据说，他很注意“稿（蓄）积于民”。平常，粮库里存粮不多，钱库里没有积蓄的金银，兵库里没有多余的武器。他把粮食、金钱、武器都交民众存放，把民众训练得很好，一旦有事，随着鼓声，民众披铠甲，挂弓箭，驾牛车，挑粮食，云涌而来。后来，西门豹就是依靠着这支兵民北击燕国，收复了被燕侵占的土地。这些传说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门豹在邺地执行法家耕战政策是有成绩的。

在当时的魏国，以魏成为首的孔老二的信徒们和以李悝、

吴起、西门豹为代表的法家，斗争十分激烈。后来，魏文侯死了，他的儿子武侯即位。武侯任用儒家，排斥和迫害法家，开历史倒车。吴起被守旧势力迫害，跑到楚国去了。西门豹也为顽固守旧的势力杀害了。

西门豹也有他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。从西门豹治邺的记载看，他的历史观是唯心的。他说：“民可以乐成，不可与虑始。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，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”。即认为群众对兴修水利的意义是不理解的，只有他自己才有远见，俨然以“救世主”自居，这当然是错误的。其实，西门豹恰恰把问题弄颠倒了。马克思主义认为，“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”。社会发展的历史，不是由于某些杰出人物的“天才”创造，而是物质生产的发展，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阶级斗争。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人民群众。不是个别英雄人物创造历史，而是奴隶们创造历史。西门豹所以能做出一些成绩，正是由于他所执行的法家路线，在客观上反映了群众利益。

孙 臆

孙臆（生卒年不详），按《史记》说，是孙武的后世孙，距孙武百余年，生于阿、鄆之间（今山东阳谷、鄆城一带）。孙臆是齐威王、齐宣王时人，其活动年代为公元前三八〇年到公元前三二〇年左右，大致与商鞅同时。

孙臆是一个著名军事家。他早年与庞涓同学兵法，后又同事魏惠王。庞涓“自以为能不及孙臆”，怕孙臆影响他的名位，便阴谋除掉孙臆。他在魏惠王面前诬告孙臆有“背魏向齐之心”，结果，孙臆被施以臆刑（剔去膝盖骨）。后来，齐国使者至魏，孙臆悄悄求见，齐国使者知道孙臆是有才能的人，秘密地把他带到齐国。齐国将军田忌将孙臆推荐给齐威王。“威王问兵法，遂以为师”。

《史记》记载了孙臆帮助田忌赛马的故事。这则故事表现了孙臆的军事才能。

田忌曾多次与齐威王及公子们赛马，但他每次都赛输了。有一天，田忌请孙臆去看赛马。孙臆仔细观察了双方的马力，发现马分上、中、下三等。回来后，孙臆就对田忌说：“你再约他们比赛一次，我有办法让你得到胜利。”田忌说：“要是那样，我就请于齐王，以千金决赌。”孙臆说：“没有问题。”比赛这一天，看热闹的人蜂拥而来。孙臆对田忌说：“现在，用你的下等马去对他们的上等马，然后，用你的上等马对他们的中等马，用中等马对他们的下等马，这样，一定能得到一负二胜的成绩。”比赛结果，果然不出孙臆所料，田忌赢了千金。田忌把事情经过告诉齐威王，齐威王高兴地说：“这件事情虽小，却可以看到先生的智谋了。”

因此，更加敬重孙臆。

齐威王打算任用孙臆为将。孙臆说：“我是受过臆刑的人，带兵打仗不方便，还是请田将军为将，我当军师。”齐王接受了这个意见。孙臆为军师后，出谋画策，辅助田忌指挥齐军打了许多胜仗。著名的有“围魏救赵”的桂陵之战和擒杀庞涓的马陵之战。

“围魏救赵”的桂陵之战，表现了孙臆杰出的战略思想。公元前三五三年，魏国军队进攻赵国国都邯郸。赵国向齐国求救，齐威王令田忌、孙臆出兵救赵。孙臆对田忌说：“兵法讲避实就虚，如今魏军围攻邯郸，赵国的将军不是庞涓的敌手，不等我军赶到，邯郸就会失陷。我们不如发兵去攻打魏国的京城大梁（今河南省开封），现在大梁只有老弱守城，兵力空虚，魏王一定会命令围赵的魏军迅速回救，我军截住奋杀一阵，一定可大败魏军。赵国的危急也就自然解除了。”田忌听从孙臆意见，向大梁发兵，魏军果然急忙离赵回救，齐军以逸待劳，在桂陵把魏军打得不败。

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孙臆的这一战略思想曾给以肯定，并指出其中有值得借鉴的地方。在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中，毛主席指出，为了打破敌人的围攻，可以采取“围魏救赵”的办法：“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，我……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，在那里大肆活动，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；这就是‘围魏救赵’的办法。”

公元前三四三年，魏国军队在庞涓指挥下进攻韩国，韩国向齐国告急，齐王又命田忌、孙臆出兵救韩。齐兵进入魏国后，魏军也撤兵回来迎战。这时孙臆用计诱敌，领兵退却，而且在第一天造了十万个行军灶，第二天只造了五万个，第

三天更少了，只造了三万个。庞涓追了三天，看见行军灶逐日减少，以为齐军都逃亡了，骄傲起来，便只带五千兵急急向前追赶。孙臏把庞涓诱进山势险恶、道路狭窄的马陵道，用乱箭射死庞涓。通过这一仗，孙臏“名显天下”，他的兵法也迅速流传开来了。

孙臏著有《孙臏兵法》，但却失传了一千多年。因此，从东汉以后，历史学家们往往把春秋末期的吴国大军事家孙武与孙臏混同起来，把孙武的《孙子兵法》与《孙臏兵法》混同起来，成为一个疑案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我国文物、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西汉前期墓葬中，同时发现了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孙臏兵法》等竹简四千多枚。这次发现，使孙武和孙臏之间的疑案得到了解决。

在《孙臏兵法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：孙臏和当时其他法家一样，大声疾呼地肯定统一战争的必要性。在当时，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的法家，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，极力提倡“耕战”政策，主张用革命暴力扫荡那些奴隶主贵族势力，用战争手段来实行中国的统一。孙臏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，在他的兵法中明确指出儒家鼓吹的“积仁义，式礼乐，垂衣裳（裳），以禁争夺”（用所谓仁义、礼乐来解决争夺），完全是欺人之谈，是根本行不通的。孙臏认为，只有“举兵绳之”，用战争手段才能真正“禁争夺”，实行统一。在对待战争这一重要问题上，孙臏的法家观点是很鲜明的。《史记》中说：“秦用商鞅，富国强兵；楚、魏用吴起，战胜弱敌；齐威王、宣王用孙子、田忌之徒，而诸侯东面朝齐。”司马迁把孙臏同法家商鞅、吴起并列在一起，也证明孙臏是站在法家一边的。

《孙臏兵法》中具有唯物主义思想。从残简中可以看出，

他注重对于情况的了解。他认为,要打仗,首先必须“知天”,“知地”,“内知民心”,“外知敌情”,而且还要充分做好军事物资的准备,把作战方案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,争取多打胜仗。

《孙膑兵法》在作战指导方面,内容比较丰富,其中许多论述表现了孙膑杰出的军事辩证法思想。孙膑认为,要避免敌我僵持,不能“以盈当盈”,要“以盈当虚”,“避实击虚”。孙膑认为,打进攻战,就要“并卒而击之”,即集中优势兵力,以众击寡;同时又要避开敌人坚实的地方,择其时机,象疾风一样,乘虚而夺之。在敌众我寡、敌强我弱时,孙膑主张“分人之兵”、“安(牵制)人之兵”,制造假象,使敌分散兵力,造成敌人局部上的少数和劣势,然后消灭敌人。他的这一“避实而击虚”的军事原则,在我国古代军事辩证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前面提到的指导“田忌赛马”和“围魏救赵”等故事,都是孙膑运用军事辩证法,“避实击虚”,集中主要力量,打击敌方弱点的生动例证。《孙膑兵法》中,还讲到要充分看到敌我双方的长处和短处,不能片面,“故善战者,见敌之所长则知其所短;见敌之所不足,则知[其所有余]”,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,发挥自己一方的优势,克制敌方的长处并暴露敌方的短处。兵法中还用朴素的辩证法论述了战争中主客、攻守、众寡、强弱、徐疾、佚劳、险易、祸福等互相对立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转化,要求因势利导,争得主动,夺取胜利。

在《孙膑兵法》中,强调“以法治军”。孙膑认为,法令明确,有组织纪律,是军队打胜仗的重要保证。如果号令不统一,士兵们行动不一致,就会打败仗(令不行,众不一,可败也)。兵法中还要求赏罚分明,主张“赏不逾日,罚不